

二十一世紀人文叢書

法人的統治

邁向以公司為本的經濟學

胡國亨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十四樓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8

ISBN 962 209 465 1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洛德加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 錄

序		ix
作者簡介		xv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獨領風騷的“市場論”	3
第二章	市場內的“黑箱”	13
第三章	通往未來的橋樑	23
第四章	公司營運的迷宮 — 市酬與租酬	39
第二部分		61
第五章	公司與科技	63
第六章	進退維谷的政府	77
第七章	公司、制度與經濟成長	91
第三部分		111
第八章	經濟大同的幻象	113
第九章	“劫灰飛盡古今平”	123
第十章	方法學的反思	137
參考書目		147

圖表目錄

圖3.1	公司內部人力資源的衍生	26
圖3.2	公司知識資源的來源	27
圖3.3	公司的融資渠道	28
圖3.4	公司與市場的整體關係	29
圖3.5	公司面對未來的策略	36
圖4.1	公司對未來的投資及其收益因素比例	46
圖4.2	公司內部薪酬實質分佈	48
圖4.3	CEO 高薪酬的元素	51
圖4.4	分析公司的策略與目標	57
圖5.1	產品系列發明的頻密度	65
圖5.2	樹幹樹枝式的途徑依賴效應	66
圖5.3	科技發明的或然與必然領域	67
圖5.4	尚待出現的必然領域	67
圖6.1	公司、政府與市場的三角關係	85
圖6.2	大公司力量與政府管制的關係	89
圖7.1	制度的元素	92
圖7.2	制度中的明文及非明文的元素	93
圖7.3	制度沿革的四個階段	95
圖7.4	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97
圖7.5	現代社會對未來的策略	100
圖7.6	現代公司發展撮要圖	103
圖7.7	公司規模比例分析模型	108
圖7.8	經濟社會中的公司規模與產業闊度	109
圖7.9	公司與其他有關因素	110

圖8.1	公司集中匯萃現象	117
圖8.2	發展快速的中心累積龐大的凝聚力，形成 “風眼式”或“旋渦式”的發展	118
圖8.3	世界經濟發展兩極化	119
圖8.4	風眼般的世界資源流向	120
圖10.1	理性的三大元素	138
圖10.2	事實與規律層疊式的關係	139
圖10.3	“高層面”事實與“低層面”規律的關係	142
圖10.4	一些關鍵性的事實(高層次事實決定低層次 規律)舉例	144
圖10.5	事實及規律演化的途徑倚賴現象	144
圖10.6	複雜結構蘊含高層面的規律與關鍵事實	145
表2.1	人類經濟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經濟組織	18
表4.1	租酬的定義	43
表4.2	CEO 的角色	50
表4.3	CEO 與大公司結構上的異同	52
表4.4	市場鞭策力量與尋租創租活動的興替	54
表4.5	公司與市場特色的比較	59
表7.1	不同社會未來的可測性與可控制性比較	101
表7.2	不同社會對未來的憧憬	101
表8.1	經濟發展與贏輸局面	122
表10.1	不同層次的理性觀	138

1

獨領風騷的“市場論”

□ 思想體系的時代烙印

研究學術思想史的人，往往因為焦點集中在思想體系本身的系統性與完整性而忽略了其時代背境。從一個較宏觀及動態的角度來看，學術思想史可說是人類歷史的一面鏡子，每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除了對那個時代的發展有指導作用外，本身亦深受當時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氣候的影響。不過受環境所限，當事人不容易意識到這種關係。

近年來，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學社會學 (sociology of science) 和科學歷史 (history of science) 方面的研究，使我們更深切了解思想體系是不可能完全抽離於該時代所面對的問題。套用哲學語言，每一套思想體系背後所蘊含的本體論的假設 (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s)，是很難抽離於主宰當時的形而上假設 (metaphysical assumptions)。當然，對一些高瞻遠矚的學者來說，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前瞻性令他們遠遠超越他們的時代，但歸根究底，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或希望解決的學術課題，卻是不能完全抽離於他們的時代。

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觀吾 (Kuhn) 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意念，他認為每一套學說是由不同層面的元素組成，在其基本概念背後，蘊藏着一系列特有的方法、形而上的假設及世界觀。這些不同的元素，千絲萬縷地互相聯繫及扶持着，自成一角地形成一個獨立的“典範架構”(paradigm)。每一個時代的學說的興

替，不單是學說表層概念的變化，而是一個“典範架構的變化”(paradigmatic change)。重要的學說的替換與更新，其實是典範架構之間的替換。觀吾甚至進一步認為，“典範架構”的分別本質上是世界觀的分別，而世界觀是對或錯，是好或壞，本身難有絕對客觀的標準和答案。

觀吾的學說在科學哲學界及科學社會界引起了很大的迴響，即使反對觀吾看法的學者，大部分都同意“典範架構”這個綜合性的概念確有發人深省之處。任何一個學說，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獨立體。劉丹(Laudan)在《進步與問題》(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1977)更進一步論證，每一個學說均有其歷史性，緊扣着源遠流長的知識傳統(intellectual tradition)。一個學說體系既不能遺世而獨立，亦無法完全擺脫當時時代所面對的問題。由此推斷，每一個學說體系的發展，在某程度上反映及配合着當時社會的氣候與變化，這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上述的看法是正確，我們在評審一套學說時，就不得不探索這套學說背後的典範架構。例如我們要問：這套架構背後的世界觀、方法論、知識論和本體論的立足點如何？這套架構的知識傳統是怎麼樣？其學說本身的時代背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背境是怎麼樣？這套學說的出現到底反映及回應當時那些實際的問題？是否充分反映其現實社會？又這學說現在是否已經跟社會脫節？

沿着這思路發展，這本書關心的第一個課題是當代經濟學背後的典範架構，這個典範架構蘊含着一個甚麼樣的知識傳統及反映一個甚麼樣的時代背境？本章首先從經濟學發展史的角度去探討這些問題。

□ 主流經濟學是一個以“市場為本的典範架構”

儘管當代經濟學的領域湧現了五花八門的學派，但這些學派背後的理論基礎大部分均是一脈相承的。概括地說，傳統及當代經濟學的主流及支流同是一個以“市場為本的典範架

構”(market-based paradigm)。即是說，傳統及當代的經濟學假設市場體系主宰經濟社會絕大部分的活動，市場制度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在它“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的引領下，市場是會達至或趨向均衡點(a state of equilibrium)。

既然學術思想不能抽離於社會、經濟及政治的背境，便必須指出，傳統經濟學的“市場論”是源自十八世紀經濟學者對當時的經濟活動的觀察，充分反映當時社會的經濟特徵與發展取向。這個典範架構既然有其先天的局限，一成不變地以此架構分析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活動，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弊病。

□ 市場為本的典範架構的發展

啟蒙期 — 亞當史密夫

儘管一些經濟思想史學者對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經濟思想的創新性有所保留，但他劃時代的著作《原富》(An E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標誌着現代經濟學的誕生是無可置疑的。在《原富》一書中，亞當史密夫有力地提出及闡明了“市場”這個概念。他認為透過自由貿易，市場會鼓勵分工，促進生產，從而促進經濟繁榮。換言之，市場制度仿似一隻“無形之手”，指引及主宰個人及社會的經濟行為，並為貌似散渙的社會帶來井然的秩序。

毫無疑問，亞當史密夫的見解是充滿創意的。他解釋了崇尚自由貿易的優點，將經濟探索的焦點導向創造財富這問題上。不消說，他的見解跟當時瀰漫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及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哲學思想與氣候甚為吻合。進步主義及自由主義認為，蘊含在人性中有一種自我改善、自我改造的意欲，不論在知識、科學、政治、經濟或社會秩序等範疇，這種意欲構成一種不斷尋求新突破的動力)(參閱哥頓(Gordon, 1991))。

工業革命引領的經濟及市場發展，使當時歐洲經濟處於一個轉型期，社會亦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現象及管制，例如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 與重農主義 (the Physiocratic doctrine) 的殘餘仍深具影響力。當時的經濟氣候，不只衝擊了亞當史密夫，更誘導了不少其他學者對市場反覆觀察與思考，對市場及其體系提出不少真知灼見，特別是市場如何能夠為經濟社會帶來秩序及漸進經濟發展。在亞當史密夫後出現的經濟學者，例如李嘉圖 (Ricardo, 1951)、米爾 (Mill, 1965)、馬撒爾 (Malthus, 1936) 及時喜 (Say, 1964) 等紛紛提出了精湛的高見。這個統稱為古典經濟學派 (Classical economics)，為市場論奠下不可動搖的基礎。

市場為本的典範架構的形成 — 由亞當史密夫至馬歇爾

從思想體系發展的角度看，古典經濟學這發展階段稱得上是經濟學史上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¹ 這段時期的學者意識到市場是一個新生的體系，具有不少奧妙及似乎高深莫測的能量，所以爭相探索其體系的特性 (system properties) 及由此引申其營運原則 (operating principles)、其應用範圍 (fields of application) 以及與當時經濟情況和政策的關係。例如李嘉圖着重分析市場體制、經濟發展下的收入分配情況 (income distribution) 及促進市場分工的原因，例如其相對優越論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時喜着眼於市場制度是否存在着整體滯銷 (general glut) 及能否解決失業的問題。馬克思 (Marx)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亦出於他對市場是否有充分自我調節能力及其道德性的懷疑。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期間，古典經濟學者大都是通過個人觀察，從社會環境及經驗中去摸索市場制度的特質。例如李嘉圖本身是地主，很自然地他關心及提出所謂經濟租項 (economic rent) 的問題。就算後期的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 1916) 都是出於對周遭事物的觀察，而提出規範效應 (economies of scale) 及經濟調節中的短期及長期 (short run and long run) 的概念，反映出當前實際的問題，這些看法加深我們對市場的了解。古典經

濟學對市場的認識固有不足，其基本缺陷是它採取供應的角度 (supply side) 去詮釋經濟活動，卻忽略了需求方面 (demand side) 的理論基礎，這個缺陷直到邊際學派 (Marginalist School) 的出現後，才得以改善。其後馬歇爾集大成，將供應與需求兩方面緊連在一起，使市場論步向一個有自我調節能力的均衡架構，奠定市場論在經濟學的主流地位，成功地化解批判市場論者的論據及市場論背後的假設，例如其個人主義哲學是否站得住腳，或市場是否有自我調節功能等。

步向形式化的經濟學 — 由馬歇爾到凱恩斯

如果我們說在古典經濟學階段，經濟學的發展正慢慢步向良性循環，那麼我們可以說，馬歇爾後的經濟學卻不自覺地慢慢走向惡性循環，邁向一個脫離社會現實的狀態，逐漸陷入“泛形式化” (pan-formalism) 的困境。促成這轉變的大氣候有二，一是受當時得令的實證主義哲學 (positivist philosophy) 所支配，誤將可量可度的標準，當為學術探討的唯一標準；二是生硬地以自然科學為師，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及發展模式套用於社會科學。

細閱馬歇爾的著作，可知道他在晚年已察覺到經濟學發展的隱憂。馬歇爾本身是一位數學大家，但他卻意識到濫用數學解釋經濟現象的歪風，可能會大肆破壞經濟學的解釋力。他認為不少的經濟因素與現象是不能用精密的數式去表達，很多精密的計算只是浪費時間，² 不幸的是，他的擔憂最後演變成事實。

自馬歇爾後，數學被大量應用於經濟學，特別是後來的微積分學。從好的方面看，傳統的市場理論變得更秩序井然。通過嚴謹的微積分學 (calculus) 的分析，產品市場 (product market) 及生產因素市場 (factor market) 之間的隱蔽關係，顯得一目了然，大大協助我們透視及建立市場理論的架構。

不過，經濟學“數學化”其實是一把“雙面的利刀”。從壞的一面看，經濟學者忽略了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在本體層面

間的分別，不分皂白地應用數學公理，後果是市場理論無可避免地走向膚淺化及脫離現實的道路（參閱胡國亨 (Woo, 1986)）。

陷入惡性循環的形式化經濟學 — “整體均衡論”

市場理論發展的初期，學者們矇矓地意識到市場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所以反覆地從不同角度摸索它的特質。亞當史密夫對市場制度的見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他對當時經濟活動的觀察入微。古典經濟學者雖然普遍肯定市場的作用，但並沒有斷定市場是一個完美的營運系統 (operative system)。在史密夫的著作中，他雖然強調市場的優點，但並沒有說它是一個完美的體系，更沒有指出市場運作會令經濟體系達至均衡點。

自馬歇爾後，經濟學發展以新古典經濟學者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的“整體均衡論”為座標，着眼點不再是市場實際的營運，研究的重心是通過邏輯及數學，企圖證明市場原則上是可達至一個“完美”的均衡點。為了達至邏輯上必然性的證明 (logically necessary proof)，他們將人及公司的特質分別簡化為“功利極大化”及“利潤極大化”的機器 (utility-maximizing and profit-maximizing machines)，而市場亦被假設為一個絕對靜止 (absolutely static) 的體系。在這些與現實脫節的假設下，證實了市場內不同的系統是可同時達至均衡（參考狄標 (Debreu, 1959)、亞羅及狄標 (Arrow & Debreu, 1981)、亞羅及韓克 (Arrow & Hahn, 1971)）。從邏輯結構的角度看，“整體均衡論”無疑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不過代價卻是犧牲了市場理論的複雜性及現實性。尤為可惜的是，古典經濟學者本來已將市場理論發展得有聲有色，但新古典經濟學派並沒有在這基礎上繼續改進，反而故步自封，將經濟學推離於現實世界以外。

在新古典經濟學主宰下的市場理論，慢慢由一個源自觀察入微的理論系統蛻變為一個與現實脫節的理論模型 (theoretical model)。在這段期間，現實世界中的市場體系正不斷演化，不斷蛻變，國際間日趨緊密合作的經濟活動、日新月異的科技與不斷在轉變中的政府角色，令市場體制更趨複雜。新古典經濟

學者縱然擁有最精密的邏輯推理及數學模式，亦對很多實際的問題及現象手足無措。

市場理論反省期

儘管市場理論愈趨精細，但其解釋力的欠奉，已是昭然若揭。不過，在學術界內部的惰性驅使下，不容易改變根深蒂固的市場理論亦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情況下，學者的取向兵分兩路，一是捍衛傳統，盡量將新的現象溶入主流的新古典市場理論中。譬如較早期的赫斯 (Hicks, 1937) 企圖用收入與利息模型 (IS-LM model) 去適應及融匯貫通凱恩斯 (Keynes) 的學說，以及近期的路加思 (Lucas, 1972) 等的理性預期學派 (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另一些學者，則嘗試在不改變傳統市場理論的大前提下，引用新的概念去補充傳統市場理論的不足。從這角度看來，凱恩斯學說的重要性，不單在於其指出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政府有干預市場的必要，而也在於它顯示傳統理論已跟時代嚴重脫節。此外，海耶克 (Hayek, 1948) 提出的“市場均衡論”，即個體計劃之間的協調 (equilibrium as coordination of individual plans)；“交易費用學派” (transaction cost school) 指出的產權 (property rights) 及交易費用 (transaction cost) 的重要性；“人力資源學派” (human capital school) 強調的人力投資在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貨幣學派” (monetarist school) 指出的貨幣在市場運作的功能，都可視為這方面的發展。

可惜的是，這兩條路線的發展並未有嶄新的突破。事實上，第一條路線並沒有正視問題的本質，而第二條路線雖然較優勝，但仍未能擺脫傳統市場理論的框框。

目前的情況是，純市場理論已是明顯地不足以解釋不斷快速轉變的世界經濟。儘管經濟學界不少人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礙於傳統包袱，普遍都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覺。經濟學當務之急，是重補自上世紀末以來的市場理論研究的空白，將現實經濟運作重新納入及融匯於經濟理論中。

□ 經濟理論的時代相對性

沿着典範架構的思路推論，靜態的宏觀經濟理論是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³ 由於偶然因素、或然因素與一些規律性的因素互相影響及重疊，人類經濟社會是不可能走上回頭路的，⁴ 所以靜態的宏觀經濟理論的時代局限性實在是無可避免的。

誇大一點說，自從有組織性的經濟活動以來，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大抵經歷了四個重要階段。分析每個階段的特性及轉變，明顯需要不同的模式與方法。從這角度而言，市場論只能分析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其中一些階段，以下是那些不同階段的一個簡單介紹。

第一階段 — 收集及狩獵期

此階段的經濟活動環繞着部落或部族，一般是逐水草而居，生產模式受地理及天然環境控制，經濟活動並沒有累積性。

第二階段 — 農業生產期

農業生產的出現，代表人類正式掌握了生產的主動性，農業生產出現剩餘 (surplus) 及累積 (accumulation) 現象，誘發出直接生產以外的分工，這是人類大規模專業經濟活動的開始。農業生產的剩餘、累積及分工，使手工業得以發展。農業產品及手工業產品的出現，引發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以有易無的貿易活動。

第三階段 — 工業發展與市場開拓期

農業發展及其生產剩餘使人類經濟活動範圍擴大，推動精細的分工，我們所熟悉的市場系統便是由此而出現。貿易衍生分

工，分工衍生了科技及流水作業的生產體系，最終引致科技的發明及應用。隨着工業革命的出現，大規模生產使公司有必要推銷產品及開拓市場。公司之間的競爭帶動了市場及公司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進一步推進科技的發展。

第四階段 — 高科技發展期

高科技的急速發展掀起了財務革命，進一步改變了公司與市場的關係。未來的世紀，標誌着科技、公司、財務、市場和政府的五角關係將會走向一個新的紀元。

□ 市場理論 “一剎那光輝並非永恆”

以上簡單的劃分，並不是交待人類經濟史的發展，亦不是提供一個新的階段劃分法 (mode of periodization)。以上的劃分的目的是要指出，主導目前經濟學主流的市場理論只不過描繪人類經濟發展史其中的一個階段，它既然不能有效地及完整地分析十八世紀前的狩獵制度及農耕制度，因此我們亦沒有理由相信它能正確地透視未來的經濟體系的運作；換言之，市場論是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

能夠在這市場制度的萌芽期，便預期到它未來的威力，亞當史密夫可算別具先見之明。在這角度看來，他的看法是劃時代的。隨他而來的古典經濟學者對市場制度的探索，亦算緊扣時代的脈搏，所以說這個時代是經濟學發展的黃金時代，相信並不為過。

可惜的是，經濟學這個時代的成功，亦不自覺地變為它日後走向僵化的條件。自新古典經濟學興起後，學者的探索便轉向鑽研市場制度的理論極限 (theoretical limit)，而不是這制度發展演化的原則 (logic of evolution)。十九世紀後，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日千里，這套源於十八世紀、反映十九世紀以貿易為本的

經濟社會的分析系統，慢慢變得落伍了。儘管近年來，不少學者已意識到它的不足，但礙於根深蒂固的傳統包袱，所以未能在基本理論層面上有重大的突破。

要為經濟學注入新生命，便必須大刀闊斧地全面批判這理論，包括其背後的典範架構的各元素。以下數章將會描繪一個“市場公司互動論”，希望為未來的經濟學提供一個新的典範架構以及勾劃這個架構的輪廓。

□ 註釋

1. 不同的經濟學者對這階段有不同的劃分，參閱蘇惟 (Thomas Sowell) 的《重新思考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 Reconsidered*, 1974)。
2. 參閱卑古 (P.C. Pigou) 編輯的《馬歇爾紀念集》(*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N.Y. Kelley & Millan, 1956, p. 422)。
3. 在微觀的世界，一些基本規律是存在的，例如邊際功利遞減定律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但其普遍性仍是有限度的。
4. 詳細解釋，參閱第十章。